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杭亭頓的戰略思想與美國全球戰略的關係

Huntington'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U. S. Global Strategy

doi:10.30390/ISC.200207\_41(4).0001

問題與研究, 41(4), 2002

Issues & Studies, 41(4), 2002

作者/Author：李文志(Wen-Chih Lee)

頁數/Page：1-2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2/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07\\_41\(4\).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07_41(4).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杭亭頓的戰略思想與 美國全球戰略的關係

李文志

(暨南大學行政系助理教授)

## 摘要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除讓杭亭頓在一九九三年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再度成為世人關注與討論的焦點，也使得杭亭頓從冷戰以來即為美國外交政策與戰略設計的「策士」立場更為清晰。「文明衝突」論是杭亭頓在冷戰結束後為美國尋找新假想敵、鞏固西方統一戰線及重塑全球新戰略的一套思維。這套戰略思維因在「911事件」中強烈彰顯美國（西方文明）與回教激進團體及國家（伊斯蘭文明）間的對抗，而使得「文明衝突」論中所揭櫫的美國全球戰略更具現實性；尤其是，美國藉由全球反恐聯盟及攻打阿富汗，而讓美國有更充裕的戰略空間因應中、俄漸趨密切的戰略合作關係，以及取得進入中、南亞地緣政治發展的絕佳機會。

關鍵詞：911事件、杭亭頓、文明衝突、地緣政治

\* \* \*

## 壹、前言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讓國際社會瞬間捲入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一九九三年所揭櫫於世「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sup>①</sup>的戰爭中？這是「911事件」後在眾多論述場域中經常被提出的論爭，也讓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在沉寂數年後再度被廣泛地引述及論辯。許多討論有關杭亭頓「文明衝突」論的觀點，若不是從理論建構、邏輯推論及事實發展等理論周延性

註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p. 22~49.



切入，就是從各種文明內涵的申論與對比中突顯多元價值選擇的必要性。<sup>②</sup>基本上，前者的看法因受限於僵化的方法論觀點，而無法廓清杭亭頓高舉「文明衝突」論的歷史全貌，更未能掌握「文明衝突」論在國際現勢上的意義；後者則非常容易讓論辯本身陷入價值性的主張，甚至是道德性的勸說，而無助於還原杭亭頓提出「文明衝突」論的本意。其實，就「文明衝突」論在國際間所引發的激烈論辯而言，這兩種看法顯然無法深窺杭亭頓提出此一主張的堂奧，而且，更偏離國際關係衍生自各國為求生存與發展的論述本質；換言之，杭亭頓的主張必須放回特定的時空脈絡中，才能從實存的歷史發展中萃取作者的思路精髓，並彰顯「文明衝突」論在美國全球戰略架構中的意義與影響。

事實上，對於「文明衝突」論這一極具作者個人色彩及策略性的論述，若要精確地攫取其論述的本質及其在現實上的意含，則必須先理解杭亭頓不僅是美國當代重要的學者—戰略學者，更是美國外交政策與戰略設計上一個重要的「策士」。杭亭頓從一九六〇年代投身於「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研究以來，其著作即明顯與美國在冷戰時代的外交政策息息相關，而且，其還曾於一九七七至七八年任職於美國卡特(Jimmy Carter)政府時期的國家安全會議，也經常為文對美國政府提出政策建議，更是民主黨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的外交顧問而對一九九〇年代主政的民主黨政府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為能明確掌握杭亭頓的戰略思想與美國全球戰略間的關係；尤其是，其提出「文明衝突」論之本意和「文明衝突」論對美國全球戰略的意義，以及「911事件」和「文明衝突」論及美國新全球戰略發展之間的關係與影響，本文的論述重點將分成兩部分：一是從杭亭頓著作生涯和美國國際地位及戰略演變間的對照，彰顯杭亭頓作為捍衛美國利益之「策士」的意義與貢獻，特別是呈現「文明衝突」論在其間的策略性意義；二是分析「911事件」對美國全球戰略的衝擊與影響，從美國的全球新統一戰線與地緣政治的層面觀察，並從中檢視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與美國全球戰略發展的對應關係。當然，作為長期觀察美國全球戰略發展的研究者而言，後文的分析與論述相當程度反映的是作者經年的心得與觀點。

## 貳、杭亭頓的重要論述與美國全球戰略的發展

### —「看哪這個人」—尼采

迄今為止，有關杭亭頓的著作大致可分為冷戰時期、冷戰終結前後及後冷戰時期，

註② 請參見下列文獻討論“The summoning,”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1993), pp. 3~26. 二十一世紀評論，「關於未來全球文化衝突的討論」及「關於未來全球文化衝突的討論II」，分見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總第19期及總第20期(1993年10月及12月)，頁5~35及頁5~15；李文志，「從文明衝突到大棋盤：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思考的變遷」，暨大學報(南投)，第3卷第1期(1999年3月)，頁369~376；薩伊德，「杭亭頓文明衝突未竟歷史全貌」，中國時報(臺北)，2001年10月17日，版3。



杭亭頓在這三個時期的論述各有發展的主軸及特色，而且相當貼近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進行論述。從冷戰時期（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側重於「政治發展」的研究，<sup>③</sup>到冷戰終結前後為文批駁美國衰微（decline）論的觀點，以及在冷戰結束後為美國的全球戰略尋找新出路，包括在一九九一年提出「第三波：二十世紀晚近的民主化」（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sup>④</sup>和於一九九三年發表「文明的衝突」到一九九六年進一步擴大成專書「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sup>⑤</sup>杭亭頓著作的最大特質就是帶有極為鮮明的規範性主張，因而使其論述展現出與美國國家利益間的特定關聯。面對這樣一位在「應然」的規範層次與現實立場非常清晰的論述者，特別是，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後更明確從美國國家利益的立場進行著述的「策士」，實有必要整體地關照其主要的論著及其與美國外交政策間的關連性，才能適確地評價「文明衝突」論對美國全球戰略的意義與影響。

### 一、冷戰時代的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政治發展」的研究

「政治發展」研究的興起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需要密不可分，早期的重要研究者如Howard Wriggins即任職於國務院的政策設計部門；這些研究者將「政治發展」視為一種策略設計，可以協助二次大戰後的新興國家增強政治控制以對抗共產黨的顛覆。<sup>⑥</sup>其實，從知識社會學的觀點而言，知識的產出與發展必有其特定的社會基礎與環境條件；亦即，特定學說與理論的提出必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與需要，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知識與理論更是如此。事實上，美國政治學界將「政治發展」研究當成是美國對外策略設計一環的作法，和美國社會學界提出「現代化理論」、經濟學界提出「經濟發展理論」的意含實是異曲同工；其中，著名的經濟學者W. W. Rostow在其素有盛名的經濟發展論著「經濟成長的階段」（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一書就直接以「一個非共產黨徒的宣示」（A Non-Communist Manifesto）作為該書的副標題，<sup>⑦</sup>展現其著述該書特定的政治立場。同樣地，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發展到高峰時，「反共產主義」（Anti-communism）及「愛國主義」（Patriotic Imperative）也

註③ 杭亭頓的著述非常豐富，根據其自己的分類涵蓋領域以「軍事政治，戰略和公民與軍事的關係」、「美國與比較政治」及「政治發展與低度開發國家的政治」三大類為主，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政治發展」的研究有關，尤其是在其1957年的成名作*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後，杭亭頓在冷戰時期與「政治發展」相關的重要著作大都是在1960至1970年代完成（此一資料的整理直接來自於杭亭頓E-Mail的內容）。

註④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註⑤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註⑥ 呂亞力，*政治發展與民主*（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79年），頁77。

註⑦ W. W. Rostow,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被視為是現代化理論的核心。<sup>⑧</sup>杭亭頓身為美國研究「政治發展」的重要學者，其論著也在此大趨勢下呈現出對美國外交政策與戰略利益的特定助益。<sup>⑨</sup>

杭亭頓有關「政治發展」的研究著述甚多，而其中較為人所引述與討論者主要有一九六五年的「政治發展與政治退化」(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sup>⑩</sup>一九六八年的「變遷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sup>⑪</sup>一九七六年和 Joan M. Nelson 合著的「不容易的選擇：在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up>⑫</sup>杭亭頓在上述著作中所呈現最突顯的論點有二。首先，杭亭頓主張以政府控制的有效性來界定及評價「政治發展」，其認為在國家建立與鞏固的階段中，必須透過「制度化」來穩定政局，讓政治組織——特別是群眾性的政黨獲得廣大民衆的支持而取得正當性，以建立有威信及效率的政府，使政治及社會的秩序得以穩定而促進國家的發展，否則將產生「政治退化」。其次，杭亭頓雖主張能制定及維持穩定且有秩序之制度的政府就是政治發展程度較高者，但在實際的情況上，其也認為因經濟發展、政治參與及社會穩定之間負向的連動關係，而使得政府很難在三者間維持均衡穩定的關係，故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菁英不應過分鼓吹大眾的政治參與及社會民主化，以免引發因期望升高而導致革命的危險性，漸進式的改革應是兼顧政府權威、社會秩序與經濟發展的主要途徑。

整體而言，杭亭頓在此階段的論述相當符合美國的外交需求與戰略利益，因為，在新興國家中強而有力的政府才能穩健社會秩序，有利於經濟發展與政權穩定；如此，這些國家才能在國內防範共產主義的興起，在國際上則成為美國圍堵共產勢力擴張的穩固盟友。事實上，杭亭頓在當時即被許多新興國家視為是鞏固政權、維持秩序，特別是建立威權政體的重要理論提供者；當然，這也包括在戒嚴時期的臺灣在內，杭亭頓即曾被當時的臺灣政府邀請來臺訪問。換言之，杭亭頓在冷戰時期有關「政治發展」的著作，有意無意地竟成為新興國家維持威權政體的重要理論根源，而這明顯和其在後冷戰時期以「鞏固第三波民主」批評如新加坡等威權國家的論點大異其趣。<sup>⑬</sup>

## 二、冷戰終結前後：從美國未衰微論到反極度樂觀的「終結主義」

冷戰終結前後迅速變換的國際情勢緊緊地牽動著美國的外交方向，尤其是從一九

註⑧ 宋鎮熙和李明龍，「現代化與依賴：發展與低度發展社會學之觀點」，成功大學社會科學學報（臺南），第7期（1994年12月），頁132。

註⑨ 呂亞力，前揭書，頁75。

註⑩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No. 17 (April 1965), pp. 386~430.

註⑪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註⑫ Samuel P. Huntington & Nelson, Joan M.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註⑬ 徐宗懋，「文明衝突論 VS. 中國威脅論——記杭亭頓月初與新馬學者一場反映東西方學者認知差異的辯論」，中國時報（臺北），1996年9月17日，版9。





八〇年代起，美國就因國內經濟的持續低迷及其與日本及歐盟經濟力量的消長，而引發一場有關美國是否衰微及全球地位是否下降的爭論。<sup>⑭</sup>在這場爭論中，主張美國衰微者以 Paul Kennedy 在一九八七年所提出「強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sup>⑮</sup>為代表；相對地，主張美國未衰微者則以杭亭頓為首，包括稍後的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及奈伊 (Joseph S. Nye) 等著名學者。杭亭頓在「美國—衰微或復興？」(The U.S.—Decline or Renewal?)<sup>⑯</sup>一文中分從美國的雙赤字、全球經濟地位的消退及制度優劣問題逐一批駁衰微論，並強調不論就經濟發展、科技成就、軍事力量、政治穩定、社會融合及意識型態的吸引力等各方資源與競爭態勢而言，美國都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尤其是，美國社會與政經體制具有獨特的開放、競爭與流動的特性，這讓美國擁有其他強國所難以項背之「自我更新」(renew)的力量。所以，杭亭頓強烈主張美國不但未衰微，而且，放眼未來美國還將難以遇到真正的挑戰者，包括戈巴契夫上臺後的蘇聯、新興的經濟強權日本及統一後的歐洲經濟共同體。

然而，就在杭亭頓為文辯護美國並未衰微之後不久，美、蘇兩大強權對峙甚久的冷戰卻也發生巨大轉變而告終結；稍後，隨即有曾任職於國務院政策設計部門的日裔美國人福山，在一九八九年提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sup>⑰</sup>一文，強調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已獲得冷戰的勝利，人類已經選擇自由民主主義作為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圭臬；進一步，福山更在一九九二年將「歷史的終結」一文擴大成專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sup>⑱</sup>透過絕對普世主義的邏輯推演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將成為歷史與個人最終且唯一的發展型態。面對美國國內急速掀起的樂觀主義，杭亭頓作為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戰略學者，其擔憂的是過分樂觀主義所掩蓋美國在冷戰結束後面對的新挑戰，而為阻止福山所提論點效應的擴大，杭亭頓也在一九九〇年為文「歷史的未來—終結主義的謬誤」(The Future of History: the Errors of Endism)<sup>⑲</sup>駁斥美國國內極度樂觀之「終結主義」(Endism)的謬誤與憂慮。杭亭頓強調在冷戰終結前後出現極度樂觀的「終結主義」，尤其是福山的說法，明顯忽略冷戰後美國及西方文明所面對的外在挑戰，而且，這些挑戰很可能瞬間就摧毀西方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長期冷戰的成果；至於，挑戰美國及西方文明主要的敵對力量及其影響，以及美國所應採取的因應對策，杭亭頓則在稍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第三波」及一九九三年的「文明的衝突？」提出明確具體的答案，就是儒

註⑭ 有關爭論的內容及主要涉入的學者，請參閱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憬藝出版社，1997年），頁22~27。

註⑮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註⑯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US - decline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Vol. 67, No. 2 (Winter 1988), pp. 76~96.

註⑰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Winter 1989/90), pp. 3~18.

註⑱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註⑲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future of history: The errors of endism," *Current*, No. 323 (June 1990), pp. 18~23.



家文明的中國及基本教義派的激進回教國。<sup>②</sup>

冷戰終結前後瞬變的國內外情勢讓杭亭頓的論述立場也旋即調整。曾經大力辯駁美國未衰微的杭亭頓，在面對冷戰結束突如其來幾近盲目的樂觀主義，也策略性地修改原有立場承認美國確已出現衰微的徵候，藉以警告盲目樂觀主義可能帶給美國的危害；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警醒美國等西方國家橫亙在西方文明前的嚴厲挑戰，尤其是，西方國家所自豪自由民主意識型態的勝利正面臨新的挑戰。的確，對一個極力維護美國霸權地位與國家利益的戰略家或「策士」而言，如何在新的歷史進程來臨之際，為美國找到新的假想敵鞏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集團）繼續主導世界秩序的運作，無疑是杭亭頓在冷戰結束之際最重要的工作與使命；<sup>③</sup>當然，這也正符合孟子所言「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的真意。

### 三、後冷戰時代：從「第三波」到「文明的衝突」

對一個戰略學者而言，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的主要戰略難題便是失去假想敵，這不但使得原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關係面臨瓦解，更可能迫使美國在新一輪的國際秩序重組與競爭過程中讓出領導地位。因此，樹立新的假想敵及重整西方國家的統一戰線，就成為後冷戰時代美國戰略學者的主要課題。深諳此道的杭亭頓即從冷戰後國際衝突的主要根源：種族、文化與宗教切入，將之與民主與非民主體制結合並上綱到全球性戰爭的層次，企圖從不同文明與政經體制的本質性差異與對立中，為美國與西方國家（同為基督教文明且實行自由民主政經體制的國家）在後冷戰時代建構新的統一戰線，維繫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因冷戰結束與世界經濟區域化而深受衝擊的聯盟關係。

回顧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前，美國所面對不利於其的國際局勢主要有：（一）國際間所期待的「世界新秩序」不但未出現，伴隨著部分東歐國家共產黨又趁機「紅潮回流」（Red Back）的是層出不窮的區域性戰爭，尤其涉及種族、文化與宗教因素的衝突，如美國與回教激進國家的衝突（美、伊波斯灣戰爭）、前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裔與克羅埃西亞裔間種族滅絕性的仇殺；（二）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的聯盟關係，因共同敵人蘇聯的崩潰而在世界秩序重建之始即瀕臨瓦解，特別是，美、日關係因雙方日漸擴大的貿易逆差而面臨攤牌，美國透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領導西歐的地位，也因法、德自主力量的抬頭而頻遭質疑；（三）國內瀰漫的樂觀主義，尤其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說，過分誇大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及影響力，而漠視橫亙在美國之前許多的外在挑戰與危機，例如，柯林頓政府對中共推動的「人權外交」就因無法獲得其他西方國家的充分支持而連遭挫敗，甚至在一九九四年決定放棄以「最惠國待遇」

註② 請參閱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298~311. 以及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pp. 207~265. 等相關章節內容的討論。

註③ 李文志，「從對美『說不』看『文明的衝突』－西方新統一戰線的建構與挑戰」，國家政策雙周刊（臺北），第149期（1996年10月15日），頁16。



(MFN) 作為對中共推動「人權外交」的憑藉，<sup>②</sup>此外，在一九九三年的維也納世界人權會議中美國更遭逢未有的失敗。<sup>③</sup>

綜觀杭亭頓為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所建立的全球戰略架構與進程，依其著作內容與順序來看可分從下列三個層次說明。

### (一) 界定新的敵人

杭亭頓在一九九一年「第三波」一書中認為，全球民主化運動歷經一八二八至一九二六年的「第一波」及一九四三至一九六二年的「第二波」，現在是自一九七四年起的「第三波」民主化，而在前兩個階段的民主化運動中都會出現為期約二十年左右的「反動潮」(Reverse Wave)，當前的「第三波」民主化也有反動者進行挑戰，而不利於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化發展，甚至還可能因此引發「第三波」民主化返退的憂慮。<sup>④</sup>杭亭頓認為從文化的觀點而言，東亞的「儒家主義」(Confucianism)及基本教義派的「伊斯蘭主義」(Islam)是對「第三波」民主化最主要的反動力量，亦即，一九八〇年代後在東亞與中東興起的「新威權主義」與「回教基本教義派」的政治主張，就是從文化價值的層次挑戰西方民主的普世地位。<sup>⑤</sup>基本上，這些從文化相對主義反動西方民主運動的東亞與中東國家，特別是，長期與美國為敵的回教激進國家，以及國力正在興起但戰略動向卻不明的中共，就成為杭亭頓重新打造西方之劍的最佳試劍石。因此，杭亭頓在一九九三年的「文明的衝突」中，指名中共與回教基本教義派國家將和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基督文明國家發生衝突的看法並不意外。

### (二) 重塑新的世界觀及戰略的佈局和進程

杭亭頓繼一九九一年提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正面臨「第三波民主反動潮」的威脅後，隨著福山在一九九二年出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也立即在一九九三年夏揭櫫「文明的衝突」並在一九九六年擴大成專書。從全球的戰略層次鳥瞰，杭亭頓在「文明的衝突」中企圖將冷戰時由東西(意識形態)集團和南北(經濟發展)關係所形成之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的世界觀，重新以「文明斷層線」所衍生的衝突將世界分為「西方」與「非西方」兩大陣營；而且，其認為隨著非西方國家經濟與軍事力量的提升，國際政治的重心不但不再侷限於西方國家之內，非西方國家更將搶奪主導國際關係發展的領導權。<sup>⑥</sup>因此，杭亭頓堅持未來驅動國際關係運轉的力量將不再是東西—南北的關係，而是西方與非西方文明間的衝突；當然，對強調自由民主主義的西方文明而言，其所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反民主之東亞儒家文明與中東

註② 請參閱 David M. Lampton, "America's China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finance minister: Clinton ends linkag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1994), pp. 597~621. 以及 Kenneth Lieberthal, "A New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6 (1995), pp. 35~49.

註③ 請參閱：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頁 228~300。

註④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208~279.

註⑤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298~311.

註⑥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p. 39~41.





回教文明的結合。②面對中共等非西方文明的挑戰，杭亭頓所提議的戰略佈局及進程，可分為短程與長程兩種。在短程的戰略上，包括：提升西方文明內歐洲與北美子文明的合作；將文化與西方接近的中、東歐與拉丁美洲融入西方；增強並維繫與俄羅斯及日本合作的關係，尤其避免日本脫離西方而擁抱中國；抑制儒家與回教國家的軍事擴張與聯盟，特別是部署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維持西方對其他文明在科技與軍事的優勢；強化能反映及合法化西方利益和價值的國際制度，並推動非西方國家加入這些國際制度。至於，在長程的戰略上，西方國家除必須維持領先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並避免地區性文明的衝突升高為主要文明間的衝突外；也應深入了解其他文明基本的宗教和哲學臆設，以知悉他們是如何理解自身的利益，畢竟，這個世界是由幾個處於聯合與衝突狀態下的文明共同組成；然後，在多元文明共容的基礎上，依文明的代表性組建國際秩序運作的架構與規則。③

### (三) 架建西方民主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間的聯盟關係

在長期以來就對民主黨政府外交政策具一定影響力之杭亭頓提出「第三波」與「文明衝突」戰略後，有意思的是柯林頓政府也在一九九三年秋推出向全球「擴展市場民主」的國家安全戰略，而戰略的重點與內容主要是：(一) 擴展民主體制有助於減少戰爭與恐怖主義；(二) 將新興民主與市場國家整合進以美國為首的核心市場民主國家的陣營中，如前蘇聯、中東歐與亞太國家；(三) 降低「不穩定國家」，即「惡棍國家」對全球市場民主國家的傷害，如中共、緬甸、伊拉克與伊朗等國。④其實，從戰略發展的進程來看，當美國重新鞏固與其他西方國家的聯盟後，下一步就是擴大西方的統一戰線，將親西方的新興民主國家納入西方陣營；於是，如何避免「第三波」民主化的「反動潮」反蝕西方與新興民主國家間的民主戰線，即如何「鞏固第三波民主」(Consolidate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⑤就成為與「文明的衝突」一樣重要的戰略佈局。

美國的全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即在一九九五年首次將年會搬到東亞的臺灣舉行，並將會議主題定為「鞏固第三波民主」，⑥而會議地點選在立場親西方的臺灣正可突顯美國支持新興民主國家的象徵；當然，親西方的臺灣民主化發展更可就近牽制中共、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東亞國家主張依「亞洲價值」

註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p. 45~47.

註③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p. 48~49.

註④ Anthony Lake,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AIT Backgrounder Series: BG-93~16*, December 10, 1993.

註⑤ 請參閱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280~316.

註⑥ 此次會議於1995年8月27~30日在臺北舉行，由臺灣的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及美國的全國民主基金會和國際民主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共同主辦，會後並將會議論文結集分別在臺灣與美國出書，在臺灣的專書名稱為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年)。



建立亞洲人自己的政治體制—新威權政體的風潮。<sup>②</sup>杭亭頓亦在會中發表「遙遙民主路」(Democracy for the Long Haul)，強調民主政體重人權、政府權力有限且著重折衝妥協的理性決策模式，故較不易發動戰爭；而且，實證上也顯示民主國家間幾乎是不發生戰爭，從一八一九年至當代死亡人數超過一千人的戰爭共有 353 場，其中 155 場發生在民主與非民主國家間，而 198 場則爆發在非民主國家間，即稍具規模的戰爭未曾發生在民主國家間。<sup>③</sup>依杭亭頓的觀點，美國在藉「文明的衝突」重新整併西方陣營的同時，更須透過「鞏固第三波民主」強化與新興民主國家的關係，以有效擴大西方民主國家的戰線。

歷經冷戰體制解構與重構的國際安全版圖，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間出現較為明確的走勢，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領導地位又逐步確立。整體而言，有利美國確保國際領導地位以建構「一超多強」的國際態勢主要是：(一)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美國承認德、法在歐洲的領導地位及支持歐盟的讓步下，得以繼續作為美國介入歐洲局勢發展及牽制俄羅斯的憑藉；(二) 美國與日本因經貿摩擦與「美軍強暴日本少女案」而日漸脆弱的戰略關係，在一九九六年雙方簽訂「美日安全聯合宣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同盟」，即所謂的美日新安保宣言後又再被強化；(三) 在柯林頓總統決定將最惠國待遇與中共人權脫勾後，美國和中共敵友不明的關係終告釐清，美國國內也從應圍堵或介入中共的爭議，轉為美國應加強擴大及介入中共的發展，雖然在一九九六年曾發生臺海飛彈危機，但美、中和解發展的趨勢並未改變，甚至柯林頓總統還在一九九八年訪中共時提出對臺灣不利的「三不」；(四) 俄羅斯擺盪的局勢在葉爾欽連任總統後終能穩定，親美的外交路線也殆無疑義，而發生在前南斯拉夫、中東與非洲地區的種族性衝突及仇殺，也在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的介入後，雖無法完全解決但也大致獲得控制；(五) 一九九七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使美國有機會透過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強力主導受創的東亞經濟及金融版圖的重建，<sup>④</sup>而且，更讓美國藉機有效壓制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因東亞經濟繁榮而為部分國家所積極主張用以對抗西方人權標準的「亞洲價值」，尤其是馬來西亞、新加坡與中共等國。美國從冷戰結束到波斯灣戰爭後試圖建構「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終於在一九九六年後有較明確的進展。當然，這也意味冷戰結束以來杭亭頓所揭櫫「文明的衝突」戰略已漸達成階段性

註<sup>②</sup> 有關美國等西方國家所主張「普世主義」之人權觀與東亞國家依「相對主義」所強調之「亞洲價值」間的爭論，可參閱下列文獻的論述：Michael Freeman, "Human right, democracy and Asian value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9, No. 3 (1996), pp. 352~366. Diane K. Mauzy, "The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debate in Southeast Asia: trying to clarify the key issue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2 (1997), pp. 210~236. Surain Subramaniam, "The Asian Values Debate: Implication for the Spread Liberal Democracy," *Asian Affairs*, Vol. 27, No. 1 (2000), pp.19~35. Michael Hill, "Asian values as reverse Orientalism: Singapore,"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 41, Issue 2 (2000), pp. 177~189.

註<sup>③</sup> Samuel P. Huntington, "Democracy For the Long Haul," Conference Paper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August 27~30, 1995. Taipei.

註<sup>④</sup> Mark Beeson, "Reshaping regional institutions: APEC and the IMF in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 (1999), pp.1~24.



的戰略目標，也讓「文明的衝突」在往後幾年較少再被提出討論；直到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爆發的「911事件」，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又成為炙手可熱的分析工具與論辯焦點。

### 叁、「911事件」對美國全球戰略的影響

#### 一檢視杭亭頓「文明衝突」論的意義

冷戰結束後國際間雖未出現如布希（George Bush）總統所期待的「世界新秩序」，<sup>⑤</sup>但國際局勢卻也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後逐漸走出冷戰結束之初的紊亂，而美國希望領導全球建立「一超多強」的目標也日漸可能。然而，對身為超級強權的美國而言，有關全球基本戰略形勢的發展及有效確保國土安全仍是其難以完全掌控的，這其中，尤以歐亞大陸上地緣政治的發展及「惡棍國家」對美國發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最受美國的關切。前者是指在歐亞大陸上中共與俄羅斯兩大強權的戰略走向，將攸關美國這一海洋勢力能否深入歐亞大陸而主導「世界島」以稱霸全球；<sup>⑥</sup>後者主要涉及中東地區激進的回教基本教義派國家或團體對美國中東政策的不滿與報復，<sup>⑦</sup>而且，美國政府為反制恐怖主義活動還特別在國務院下成立「反恐怖主義辦公室」（Counterterrorism Office）專責處理。<sup>⑧</sup>

基本上，美國的因應對策可分從地緣政治及安全防禦兩個面向來掌握。首先，在地緣政治上；面對美國分別透過「北約東擴」與「美日新安保宣言」，從歐亞大陸的兩端強化對歐亞大陸的掌控，以利建構「一超多強」的國際權力體系，中、俄也從一九九六年起開展更為密切的互動關係，雙方先在同年四月將雙方的關係提升為「戰略協作的夥伴關係」，並在稍後與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在上海舉行「五國高峰會」，進一步強化歐亞大陸上的整合程度，當然，這也有利於中、俄各自處理與中亞邊境回教國家間的關係，切斷國內回教分裂主義的外援管道；一九九七年六月中、俄又簽定元首定期會議協定，讓雙邊關係正式邁入元首定期互訪的層次。<sup>⑨</sup>進入二十一

註⑤ 「世界新秩序」（world new order）是布希總統在1991年對國會提出年度國情諮文中，對冷戰結束後世界局勢的新期待，至於「世界新秩序」的內涵為何則無具體的描繪。

註⑥ 請參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 3~56. 另參考陳必照教授在大棋盤（臺北：立緒文化，1998年）中文版「序文」中對此書的精采書評：美國如何在世界島上玩這一盤棋？並在序文中直言：本書「與美國執行的維持美國在國際體系主宰與主導者的角色，可以說是『有謀而和』」。

註⑦ 其實 Zbigniew Brzezinski 更認為美國冷戰後在歐亞大陸上所面對最危險的潛在威脅就是中共、俄羅斯及回教的伊朗結合成反美的聯盟，而且，其認為這次反美聯盟很可能是由中共帶頭而起，請參閱 Zbigniew Brzezinski, p. 55。

註⑧ 請參考美國國務院網站上相關資料，<<http://www.state.gov/s/ct/>>。

註⑨ 有關中共與俄羅斯雙邊關係的發展，請參李登科，「五十年的『中』、美、蘇（俄）關係」，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42卷第10期（1999年），頁45~68。



世紀，新上任的俄羅斯總統普丁在「戰略協作的夥伴關係」下，除先與中共簽署「關於進一步加強軍事領域合作備忘錄」外，也在隔年七月和中共簽定「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而條約中的第九條即明言「如出現締約一方認為會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針對締約一方的侵略威脅情況時，締約雙方為消除所出現的威脅，將立即進行接觸與磋商。」<sup>④</sup>從此條文的精神搭配其他增加雙方政軍合作條文的內容來看，中、俄幾乎已形成準軍事聯盟的關係。此外，原於一九九六年上海召開的「五國高峰會」也在二〇〇一年六月決議讓烏茲別克加入而擴大成「上海合作組織」，使得歐亞大陸上的整合及聯盟關係更趨緊密，增加中、俄雙方因應美國企圖假「地緣政治多元主義」（Geopolitical Pluralism）<sup>⑤</sup>先分化再掌控歐亞大陸的戰略空間。

其次，在國防安全防禦上，在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及其盟國軍隊和以色列最感困擾與驚恐的是來自伊拉克的飛彈襲擊，美國雖有部署愛國者飛彈進行攔截但成效並不彰顯；因此，從防禦戰略的觀點而言，波斯灣戰爭對美國的最重要啓示是如何防禦飛彈的攻擊；<sup>⑥</sup>尤其是，隨著核武及生化武器製造技術的擴散，更讓防禦飛彈攻擊成爲極爲緊迫的課題。一九九三年新上任的美國柯林頓政府即由國防部長亞斯平（Lester Aspin）宣佈終止「戰略防禦先制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即一般所謂的「星戰計劃」，改以彈道飛彈防禦計劃來取代；而其主要內容包括反戰術彈道飛彈及國家飛彈防禦兩大系統，目的是爲防禦「流氓國家」彈道飛彈的攻擊。<sup>⑦</sup>美國基於本身國土防禦及全球各地盟邦防禦的需要，遂分別在國境內推動「全國飛彈防禦體系」（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及在海外盟國部署「戰區飛彈防禦體系」（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系統，防範來自於「流氓國家」對美國本土或重要友邦發射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美國的憂慮在一九九五及一九九六年臺灣海峽的飛彈危機中獲得確證，這使得柯林頓政府也在一九九六年決定優先發展TMD系統以應付現有的威脅，並決議開發NMD技術以便在二〇〇〇年時具有防備美國本土的能力；稍後，北韓更無預警地在一九九八年發射中程的「大浦洞一號」飛彈飛越日本的領空，讓美國與日本決議加速對TMD的研發與部署。<sup>⑧</sup>

其實，北韓無預警地發射飛彈對美國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因爲，北韓竟然在美國長期監控下仍能研製並發射飛彈，而美國只能事後才得知。這意味不受國際核生化武器管制體制約束的「惡棍國家」一旦對美發射洲際彈道飛彈，美國幾乎是無任何防禦的措施可以反制；當然，這也意味另一讓美國極爲憂慮的國際恐怖主義團體若對美發射載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飛彈，美國也將同樣無反制的措施與能力。甚受柯林頓政

註④ 中國時報（臺北），2001年7月20日，版11。

註⑤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198.

註⑥ 請參閱曾祥穎譯，美國飛彈防禦的過去與現在（臺北：麥田，2001年），第四及第五章。原著爲K. Scott McMahon, *Pursuit of the Shield: The U.S. Quest for Limite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7).

註⑦ 曾祥穎譯，前揭書，頁278。

註⑧ 曾祥穎，「譯序：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前揭書，頁5~10。





府倚重的前國防部長培利（William J. Perry），在其與前國防部國際安全政策助理部長艾許頓（Ashton B. Carter）合著的「預防性防禦：後冷戰時代美國的新安全戰略」一書中即指出「災難性的恐怖主義」將對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與國際安全構成所謂「A」級的威脅－威脅美國的生存，因為「隨著毀滅性技術的日益普及，社會的日趨複雜，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因而也會愈容易受到攻擊，恐怖主義有可能在未來……從劫機、一般性爆炸和挾持人質，轉變為使用具有巨大摧毀力量的核生化武器……擁有這種武器的恐怖主義活動，可以輕易地……越過邊界，在第一時間對美國本土造成直接的威脅。……這種威脅有可能改變美國人對國內安全的看法……這個幽靈為『災難性恐怖主義』。」<sup>⑥</sup>培利預警式的觀察與憂慮確實具有前瞻性的意義，只是「災難性恐怖主義」－「911事件」來得比培利和大多數人預期的更快與突然，而且，其採行的恐怖策略與戰術更超出傳統對恐怖主義活動的想像與知識建構之外。然而，從杭亭頓「文明的衝突」觀來看，「911事件」中強烈展現的美國（西方文明）與回教激進團體或國家（伊斯蘭文明）間的對抗意含，卻也讓「文明衝突」論中提示的戰略進程具有更現實的意義，亦使美國獲得建構全球新統一戰線的重要憑藉，並得以切入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發展的絕佳機會，讓美國有更充裕的戰略空間因應中、俄漸趨密切的戰略合作關係和歐盟日漸獨立的政經走向。

美國在二〇〇一年共和黨的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上任後，因採取較柯林頓政府更突顯單邊主義的強硬外交路線，不僅不顧歐盟及中、俄的反對仍積極整備建構NMD及TMD系統，更不理俄羅斯的感受繼續推動「北約東擴」及有意廢棄「反彈道飛彈條約」（ABM）和拒簽歐盟等國支持的「京都議定書」；而且，小布希政府也將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從柯林頓政府時期的「戰略夥伴」調整為「戰略競爭」，<sup>⑦</sup>險些讓雙方戰機在南中國海上方擦撞的事件難以收拾；更關鍵的是，美國放任中東情勢的惡化讓其與回教激進國家及團體間的關係也趨於緊繃。基本上，新上臺的小布希政府在外交方向與政策作為上，造成美國與其他西方盟國及其和中、俄間新的緊張關係，而且，中東的情勢也隨著以色列溫和派政府的下臺而更趨緊張。剛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形勢，就在美國與中、俄及其他盟邦的互動逐漸交惡，以及中東情勢又將一觸即發之際，似乎有走向全球性「新冷戰」的趨勢。不過，「911事件」卻讓美國和主要大國間日趨緊張與對立的戰略態勢，因為要合作對抗國際恐怖主義而出現轉圜與和解的契機，也為美國逐漸走窄的外交路線另闢新的戰略空間。

整體而言，「911事件」對美國全球戰略佈局的意義可分從全球新統一戰線及地緣政治兩個層面來掌握。首先，「911事件」讓美國得依「反恐怖主義」的作戰需要及戰略部署而區隔出不同層次的利害關係國，藉以建構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新統一戰

註⑥ 許綏南譯，預防性防禦：後冷戰時代美國的新安全戰略（臺北：麥田，2000年），頁45～46。原著為 Ashton B. Carter & William J. Perry,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註⑦ 李文志，「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臺灣的戰略思考」，東吳政治學報（臺北），第13期（2001年9月），頁143。





線：

一、美國「反恐怖主義」戰線的第一層是美、加、澳及西歐與日本等所謂核心的西方國家，美國透過核心西方國家的軍事動員，特別是北約盟國的武力支援來鞏固西方的陣營；當然，也藉此區隔出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的利害之別，而「911事件」中的回教恐怖主義團體（奧薩瑪·賓拉登的「基地」組織）也正予杭亭頓「文明的衝突」論得以落實的憑藉。

二、美國第二層的「反恐怖主義」戰線是建構全球的反恐怖聯盟，尤其是，趁機強化與中共（打擊新疆回教獨立主義者）及俄羅斯（壓制反俄羅斯的車臣游擊隊）兩國回教激進恐怖主義的共同利害關係，讓歐亞大陸上的兩大國在「反恐怖主義」的戰線上成爲親西方的盟友；而且，此舉還可藉機削弱中、俄兩國與中東回教基本教義派國家的關係，以減少激進回教國家獲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長程彈道飛彈的機會。這不僅符合杭亭頓在「文明衝突」論所建議將俄羅斯拉爲親西方的成員，更可藉以阻撓儒家文明的中共與回教激進國家進行軍事合作與擴張的機會。

三、美國所建構的第三層統一戰線是拉攏溫和的回教國家，美國透過「反恐怖主義」作戰將回教世界區隔成親西方的溫和派及反西方的激進派，前者不僅是指直接支援美國對阿富汗用兵的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阿曼及烏茲別克等國，還包括埃及、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國；後者則包括長期反西方及支援恐怖主義活動的回教激進國，特別是阿富汗及伊拉克。美國透過分化回教世界而激化其內部的矛盾與衝突，<sup>①</sup>以避免「穆斯林陣線」因美國攻擊阿富汗而由北非、中東、中亞、南亞到東南亞進行串聯的可能性。依杭亭頓「文明衝突」觀而言，這條由北非到東南亞的「穆斯林陣線」將是另一條橫亙在歐亞大陸南緣的「文明斷層線」。

其次，就地緣政治的發展而言，自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提出「心臟地帶論」（Heartland）後，歐亞大陸幾已成爲逐霸全球者必爭之地；而美國從馬漢（Alfred T. Mahan）揭櫫「海權論」（Sea Power）以來，歷經冷戰時代也僅能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與歐亞大陸上的強權進行攻防，尤其是，美國的勢力更從未深入中亞及南亞的大陸上。<sup>②</sup>「911事件」後由美國主導的「反恐怖主義」作戰，讓美國有機會趁著對阿富汗作戰而將影響力深植於歐亞大陸的中間地帶。其實，在此次「反恐怖主義」作戰聯盟中，巴基斯坦支持美國的主因是近年來美國與印度雙邊關係的積極改善，讓巴基斯坦必須設法平衡美國在印、巴間的立場，甚至藉由此次反恐怖作戰拉攏美國支持巴國的喀什米爾政策，以緩和印度正極力壓制「查摩—喀什米爾」境內的親巴國的回教分離運動；<sup>③</sup>當然，對長期支持巴基斯坦的中共而言，也在「反恐怖主義」的旗幟下難以阻撓巴基斯坦將美國勢力引入中亞地區，而這也使美國得以繼改善與南亞之

註① 王崑義，「恐怖主義與轉變中的國際安全—兼論「九一一」事件以後的兩岸關係」，新世紀國際安全與兩岸關係研討會論文（北京），2001年10月15~16日，頁18。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中國軍事科學院；協辦單位：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註② 李文志，「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臺灣的戰略思考」，頁138~144。

註③ 中國時報（臺北），2001年10月2日，版2。



印度的關係後，又能加強和巴基斯坦及其他中亞地區回教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如烏茲別克。

美國勢力進入中、南亞對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主要影響有二：一是在歐亞大陸的南方地帶建立美國介入歐亞勢力重構的橋頭堡，有利於美國勢力從中、俄交界處進入歐亞大陸的中間地帶，增加牽制中亞陸塊地緣政治發展的重要依憑，尤其是，此區域因擁有僅次於波斯灣地區的龐大石油及天然氣資源，早已引發一場暗潮洶湧的勢力範圍爭奪戰；<sup>⑤</sup>二是中亞及南亞地區剛好位於中共與俄羅斯的後方大門口，這使得美國勢力進入此區域後，可搭配原先在歐亞大陸東西兩邊所架構的「美日安保條約」及「北約組織」，分從海陸兩邊施壓及牽制中共及俄羅斯兩大強國日趨緊密的合作關係，事實上，這一趨勢似有呼應美國另一重要「策士」—布里辛斯基所提議經由「地緣政治多元主義」的部署以避免歐亞大陸上出現反美聯盟的策略。<sup>⑥</sup>而且，美國此次藉「反恐怖主義」作戰將其勢力深植中共後方，更有平衡中共透過「上海合作組織」及「中共—東協自由貿易區」強化其為海陸大國的戰略意義，牽制中共在歐亞陸塊上海陸兩邊戰略的佈局。<sup>⑦</sup>另外，就「文明衝突」的觀點來看，美國勢力進入中、南亞—「反恐怖主義」的第三層統一戰線正好可配合反全球「穆斯林陣線」的地緣戰略，讓美國在歐亞大陸南緣中間地帶建立的陣地可從中切斷由北非—中東—西亞—中亞—南亞—東南亞所串成的另一條「文明斷層線」，也是潛在的「斷層戰爭線」。<sup>⑧</sup>

綜觀杭亭頓於「文明衝突」中鋪陳的戰略思想與美國在「911事件」後全球戰略的佈局，顯然有如下重要的觀察意義：一是美國藉由「反恐怖主義」的統一戰線，再次鞏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陣營；二是祛除杭亭頓「文明衝突論」中所最憂慮的情況，即威權的中共與激進的回教國家串聯成反美國的聯盟；三是美國藉由「反恐怖主義」的共同利益拉攏中、俄兩大歐亞大陸上的強權，進而牽制中、俄日趨緊密的排美關係；四是美國因「反恐怖主義」作戰而得分化回教世界並使其影響力進入中、南亞地區，間接瓦解另一潛在的「文明斷層線」—「穆斯林陣線」。不過，杭亭頓可能沒想到的是，啟動美國重塑世界秩序的憑藉（假想敵）竟是激進的回教恐怖主義「團體」，而不是美國近年投以較大關注的「中國威脅論」或是回教激進國家；然而，這卻也讓杭亭頓在其論述中未清楚交代的矛盾獲得解決，那就是：文明既是超越國家的，但何以「文明衝突」的主要分析單位—在世界中最重要角色仍是民族國家，<sup>⑨</sup>而不

註⑤ 包理述，「列強爭逐油源中亞多事之秋」，中國時報（臺北），1997年9月22日，版10。

註⑥ 有關美國這一海洋霸權國家對歐亞大陸的包圍戰略佈局與進程的相關討論，可參閱 Zbigniew Brzezinski，李文志，「從文明衝突到大棋盤：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思考的變遷」，頁373～375。

註⑦ 李文志，「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臺灣的戰略思考」，頁148～151。

註⑧ 依據杭亭頓「文明衝突」論的戰爭概念，不同文明間的「文明斷層線」通常就是容易爆發戰爭的「斷層戰爭線」，請參閱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pp. 207～265。

註⑨ 杭亭頓在1993年發表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即特別主張這一觀點，而且，在1996年將原論文擴大成專書時，在書中仍持續強調這一看法；當然，這也正符合其身為美國重要「策士」的立場，為美國找到新的假想敵—中國及回教激進國家。



是超越國家的國際或全球化的實體，特別是國際恐怖主義團體。無疑，這也是「911事件」對傳統國際關係及戰爭形式與內涵造成重大衝擊與省思的關鍵。

## 肆、結語

從現實主義（Realism）的觀點而言，國際關係即強權的關係，國際關係的主要學說與理論幾乎就是反映強權的世界觀<sup>⑤</sup>與戰略意圖。美國是後冷戰時代國際社會唯一的超級霸權，其重要戰略學者與「策士」所出版的重要國際關係論著自然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杭亭頓不僅在美國學界與政界享有盛名，對美國政府的決策也有一定的影響力，而其提出的「文明衝突」論當然也就成為各方解讀的重要論著，事實上，透過對其相關著作的解讀也的確有助於掌握後冷戰時代美國全球戰略的走向。因此，對於杭亭頓的「獻策」之書若試圖以理論建構或文化多元主義等觀點作評論，不僅無法探得作者著述的本意及戰略企圖，更偏離國際關係學說實乃反映特定世界觀及衍生自各國為求生存與發展的論述本質。無疑，杭亭頓從一九六〇年代研究「政治發展」成名後，到一九八〇年代冷戰終結前後為文辯駁美國未衰微，以及在冷戰結束之際發表「第三波」捍衛「第三波民主化」潮流和在一九九三年起高舉「文明衝突」論，一再說明杭亭頓是一為美國生存與發展尋求最適戰略的學者。

杭亭頓提出「文明衝突」論是為美國在冷戰後界定新的假想敵，並精心設計系列相關的戰略佈局與進程。然而，杭亭頓的用心因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起國際局勢的發展漸趨於有利美國領導權的鞏固；其中，包括北約與歐盟關係的確定、美日新安條約簽定、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穩定、美國與俄羅斯關係的明確化及東亞金融風暴對「亞洲價值」的打擊等，都讓杭亭頓「文明衝突」論逐漸失去對美國提供戰略引導的功能與意義。不過，「911事件」卻因直接觸及「文明衝突」論中最敏感及衝突性的核心處，剎那間使國際社會好似要進入「文明衝突」的世界性戰爭中，而又讓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成為各方關注與爭辯的焦點；而且，美國在「911事件」後所推動「反恐怖主義」作戰的部署及衍生的戰略意義，也確實和杭亭頓在「文明衝突」論中提示的世界觀及戰略佈局有神似之處。

這包括美國藉由「反恐怖主義」作戰重新鞏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祛除「文明衝突論」中所憂慮之中共與激進的回教國家串聯成反美的聯盟；美國透過與俄羅斯、中共的反恐合作關係而削解歐亞大陸兩大強權聯合反美的戰略態勢；美國因反恐作戰而得將勢力延伸至中亞回教世界，並得以分化回教世界為支持與反對恐怖主義的國家類別，而這其實和小布希總統特指伊朗與伊拉克為「邪惡軸心」（The Axis of Evil）<sup>⑥</sup>成員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處。當然，美國「反恐怖主義」作戰的佈局與進程並非在「文明衝突」的大纛下進行，也不是為實踐杭亭頓的戰略構想而推動，但不可否認，杭亭

註<sup>⑤</sup> 具體的論證可參閱 K. J. Holsti, *The Dividing Discipline* (Boston: Allen & Unwin, 1985), pp. 82~128.

註<sup>⑥</sup> 「邪惡軸心」一詞是美國總統小布希在 2002 年初對國會所發表之國情諮文中的用語，指由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北韓、伊朗與伊拉克所構成對美國具威脅性的國家群。



頓從「第三波」到「文明的衝突」中所揭示的全球戰略形勢與美國的戰略部署，確實提供讀者在觀察「911事件」與後續國際形勢發展時一個很好的分析觀點與架構。

「911事件」的發生除對既存有關國際政治的論述產生相當的衝擊，特別是有關全球化與地緣政治的意含、戰爭的定義及民族國家角色的定位等；也讓我們有機會再次系統地檢視杭亭頓的戰略思想與美國全球戰略發展間的特定關連性及意義；同時，也使我们更清楚認識：國際關係論著背後通常隱藏著特定立場、世界觀與戰略意圖，尤其是，強權國家的國際關係論者及其論著更是如此。

\* \* \*

(收件：90年12月14日，修正：91年1月30日，再修正：91年3月7日，接受：91年7月8日)



# Huntington'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U.S. Global Strategy

*Wen-chih Lee*

## Abstract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roposed by Huntington in 1993 became the center of extensive discussions again after the Sept. II terrorist attacks on America in 2001. This makes clear that Huntington has been an influential tactician on U.S. foreign policy and strategy design for a long tim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helps the U.S. to seek new potential adversaries, consolidate the Western united front, and reconstruct her global strategy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The Sept. II<sup>nd</sup> attacks strongly highlighted the antagonisms between the U.S.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slamic extremists/countries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In particular, the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coalition and war on Afghanistan allows the U.S. more space to cope with the China-Russ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S. to interfere in geo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iddle/South Asia.

**Keywords:** Sept. II terrorist Attacks on America;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Geopolitics.





### 參考文獻

- Carter, Ashton B. & Perry, William J. 著，許綏南譯（2000），「預防性防禦：後冷戰時代美國的新安全戰略」，臺北：麥田。
- McMahon, K. Scott 著，曾祥穎譯（2001），「美國飛彈防禦的過去與現在」，臺北：麥田。
-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3），總第十九期及總第二十期，《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20。
- 中國時報（臺北），2001年7月20日，版11。
- 中國時報（臺北），2001年10月2日，版2。
- 包理述（1997），「列強爭逐油源 中亞多事之秋」，中國時報（臺北），1997年9月22日，版10。
- 呂亞力（1979），《政治發展與民主》，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宋鎮照和李明龍（1994），「現代化與依賴：發展與低度發展社會學之觀點」，《成功大學社會科學學報》，7，129-156。
- 李文志（1996），「從對美『說不』看『文明的衝突』—西方新統一戰線的建構與挑戰」，《國家政策雙周刊》，149，16-17，臺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 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憬藝出版社。
- 李文志（1999），「從文明衝突到大棋盤：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思考的變遷」，《暨大學報》，3(1)，369-375。
- 李文志（2001），「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臺灣的戰略思考」，《東吳政治學報》，13，129-174。
- 徐宗懋（1996），「文明衝突論 VS. 中國威脅論—記杭亭頓月初與新馬學者一場反映東西方學者認知差異的辯論」，中國時報（臺北），1996年9月17日，版9。
- 陳必照（1998），「序文」，《大棋盤》，臺北：立緒文化。
- 薩伊德（2001），「杭亭頓文明衝突未竟歷史全貌」，中國時報（臺北），2001年10月17日，版3。
- Ajami, Fouad (1993), "The Summoning," *Foreign Affairs*, 72(4), 3-26.
- Ashton B. Carter & William J. Perry (1999),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Beeson, Mark (1999), "Reshaping regional institutions: APEC and the IMF in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12, 1-24.
- Brzezinski, Zbigniew (1997),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 Freeman, Michael (1996), "Human right, democracy and Asian values," *The Pacific Review*, 9, 352-366.



- Fukuyama, Francis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 Hill, Michael (2000), "Asian values as reverse Orientalism: Singapore,"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1, 177-189.
- Holsti, K. J. (1985), *The Dividing Discipline*, Boston: Allen & Unwin, 82-128.
- Huntington, Samuel P. & Nelson, Joan M.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5),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17, 386-430.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88), "The US - Decline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67, 76-96.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0), "The Future of History: The Errors of Endism," *Current*, 323, 18-23.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22-49.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5), "Democracy For the Long Haul," Conference Paper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aipei.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ake, Anthony (1993),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AIT Backgrounder Series: BG-93-16.
- Lampton, David M. (1994), "America's China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Finance Minister: Clinton Ends Linkage,"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597-621.
- Lieberthal, Kenneth (1995), "A New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74, 35-49.
- Mauzy, Diane K. (1997), "The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debate in Southeast Asia: trying to clarify the key issues," *The Pacific Review*, 10, 210-236.
- McMahon, K. Scott (1997), *Pursuit of the Shield: The U.S. Quest for Limite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bramaniam, Surain (2000), "The Asian Values Debate: Implication for the Spread Liberal Democracy," *Asian Affairs*, 27, 19-35.

"The Summoning," (1993), *Foreign Affairs*, 72. 3-26.

"Counterterrorism Office"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s/ct/>

